

# 从“局外人”到“反抗者” ——默尔索在边缘情境中的自我超越

贺金茹

(天津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 中文教研室,天津 300221)

**[摘要]**《局外人》揭示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荒诞性,并通过主人公默尔索的精神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应对荒诞的正确态度和途径是在“爱”与“对话”中“重新开始”,重建人与世界、与他者的关联,创造性地进行反抗。而默尔索从“局外人”向“反抗者”的成长,则是在辍学、入狱、被判处死刑等一系列边缘情境中逐步实现的。

**[关键词]**阿尔贝·加缪;局外人;反抗者;边缘情境;对话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09)04-0121-04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是“荒诞”哲学与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局外人》(1942)虽然不是加缪的第一部作品,但却是他成为世界性经典作家的开端。加缪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不在于体认到世界的荒诞,而在于他思考并给出现代人面对荒诞世界所应持有的正确态度;《局外人》的重要性不在于揭示出人被社会压抑、排斥出局的生存困境,而在于作家通过一个个“边缘情境”的设置,使得以默尔索为代表的现代人开始自我审视,不断修正对人与世界、与他者关系的理解,并走上创造式的反抗之路,完成从“局外人”向“反抗者”的超越。

所谓“边缘情境”,是指由于某种严重的变故,如亲人死亡、身患绝症、家庭破裂、面临生死关头、犯罪等,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个人置身于日常的生活秩序之外。<sup>[1](P13)</sup>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开始质疑甚至否定原来的所谓正常生活,包括社会既定的规范与价值尺度、生命意义及身份归属等,进而陷入生存无意义的困惑与空虚之中。我们承认,边缘处境本身是一种给人制造困境的消极因素,然而,超越困境的希望以及潜在的可能性也深蕴其中。“边缘”本是一个地形学概念,指某一特定区域的尽头或末端,超出这一尽头或末端,便意味着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特定地域;另一方面,边缘也是两个异质世界相互撞击和交叉的地带,既不完全属于这一方,也不完全属于另一方,但同时具有双方的某些特征,具有双重性。就某一地域而言,它是边缘,但就两个交接的地域而言,它又是中介。因而,边缘既是危机与危险之源,同时又是架通双方的桥梁或中介。感知心理学认为,没有两眼的并用,没有一种双目的视觉,就绝不会意识到空间的第三维。边缘处境的双重特征,恰恰赋予置身边缘者朝向东西及内外的双目视觉。所谓“第三维空间”是阳光与阴影的交叉地带,既存在着矛盾和差异,同时也孕育着对话与兼容的可能性、变动不拘的流动性以及新的意义生成的创造性。在这种意义上讲,边缘处境决非世界结束的地方,相反,它正是世界阐明自身的<sup>[2]</sup>地方。

社会如棋局。身处其中之人即“局内人”,要么成为下棋者,要么成为棋子;前者是社会生活法则的制定者、掌控者,后者是法则规定下生存的小人物,其言说与行走方式均受前者的影响和制约,或者说“棋子”是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人们从小就被在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下进入局内。进入局内成为棋子或下棋者,这是天经地义的。”<sup>[3](P28-29)</sup>在《局外人》中,以“社会主义”自居的检察官、预审法官及律师,代表所谓“上帝正义”的神甫,以及养老院院长等人,是社会棋局中掌握着话语权及“游戏”规则的“下棋者”,正是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审判并最终宣判了默尔索从肉体到精神的死刑。雷蒙·马松、养老院的门房老头和沙拉玛诺老头等,则代表着那些让社会感到安全,因而社会允许他们暂时存在的“棋子”。看似“庞然大物”的马松在“下棋者”眼里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由其法庭上为默尔索所作证词的无效性可以推知;但他依然坚持要说“我甚至还要说”,并说出一些没有新意的话来。<sup>[4](P19-20)</sup>以他为代表的下棋者渴望通过语言表达确立自己在局内的地位,“下棋者”正因为他的话语空洞无物、对自身利益构不成挑战和威胁,所以才包容了他的存在。小个子雷蒙因生活困顿遭到鄙视,但他却将生存的苦难用暴力的方式转嫁到比自己更为弱势的人,即作为民族和性别双重边缘人的阿拉伯女子身上,以求获得一种心理平衡,并建立虚幻的优越感。养老院的门房老头因为穷困进入养老院,后来毛遂自荐当上了门房,他总要用“他们”、“那些人”称呼其他被养老院收养的人,以此体现出身为“管理者”的“我们”的高人一等。而同样受穷困压迫的沙拉玛诺老头则以狗的“主人”自居,对其任意斥骂,直到狗失踪之后,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与狗是相依为命的平等个体。这些社会小人物均为不合理社会体制的受害者,但他们看似各异的行为都与现行制度相认同,进而在麻木无知中沦为维护社会不合理性的“棋子”,社会自然也会在一定限度内“保护”着他们

[收稿日期] 2009-10-12

[作者简介] 贺金茹(1979-),女,河北邯郸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的生存。

然而,当社会发现某个“棋子”拒不遵守其既定规则与秩序时,便会将之彻底排斥出局,使之沦为边缘化的局外人,如默尔索。上大学的时候,他充满雄心壮志,渴望在学业上、社会中有所作为,但是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世界之于默尔索,成为了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与光明的宇宙”。<sup>[5](P196)</sup>被学校放逐后的默尔索,立足其边缘化的生存困境,对以往的生活和追求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一切都没有意义:“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sup>[4](P23)</sup>对默尔索而言,旧的意义世界坍塌,新的意义世界却不知从何处建立,因而陷入精神空虚之中,于是,当老板为其提供到巴黎工作的机会时,他表示“实在是可有可无”<sup>[4](P23)</sup>;当玛丽问他是否爱自己是否愿意和她结婚时,他表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sup>[4](P24)</sup>;当雷蒙问是否愿意做朋友时,他说“做不做都可以”<sup>[4](P16)</sup>。此时,维系生存的只是吃、喝、睡、做爱等生理欲求,按照本能的要求在日日的重复中过活。尽管他也曾对生活、对社会有所观察,如某周末站在阳台上观看他人散步,但仅限于在局外边缘立场上的“看”而已,没有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建立联系,因而他人的“高兴地说说笑笑”对他没有任何意义<sup>[4](P12)</sup>;默尔索偶尔也会希望将自我纳入一个共同体,在其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归属,如当一个运动员朝自己喊“我们赢了他们”时,他会点头表示认同,回喊一声“没错”。<sup>[4](P13)</sup>但这种应答关系毕竟太过简单、被动,缺少持续性;而且“我们—他们”、“自我—他者”之间处于狭隘的二元对立状态。整体而言,默尔索的心灵对世界、对他人,甚至对自我都是封闭的,仅仅活在当下的本能欲望之中,不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不追忆过去,也不憧憬未来,成为一个局外孤独者。因为在此时的默尔索看来,唯有如此,方能跳出浑沌的棋局,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无需戴上人格面具与社会同流合污的人。正是在坚持本真的意义上,默尔索得到了加缪的赞赏,如:“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他拒绝说谎……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要花招”<sup>[6]</sup>;“一个基督式的人物”<sup>[7](P23)</sup>等等。

## 二

活得真实固然是人的可贵之处,尤其是在伪饰成为社会主导特征之时。但人生的意义并不完全体现在以真实的方式活着,更应体现在对美与善的彰显和创造上,而后者只有当个体以有效的方式进入社会,并在为社会的改善和进步有所贡献时才能体现出来。我们知道,加缪从来就不是一个在困守书斋的人,而是一个积极地思考生活,并努力通过自己的参与来改善生活的社会活动家。因而,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在大加赞美默尔索的真实的同时,没有忘却对其所代表的本能化生存方式进行反思。作家通过默尔索杀死阿拉伯人的事件,引导读者思考自我本能对他者生命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加缪试图以此告诉我们:彻底的局外孤独者是没有出路的。靠本能的引领生存,固然可以保持真实,但也仅仅是动物态的低级生

存方式而已,它只能揭示出世界的荒诞性,却对人如何应对荒诞没有建设性意义。

因杀人而被捕入狱,这是作家为默尔索的精神成长所设置的另一边缘情境。狱中生活使默尔索从只关注当下的本能化生存状态转向对自我精神的审视,在此过程中,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并趋于明确化。首先,默尔索对“真实”的理解从生理、本能层面向理性思考层面发展。他在一份偶然发现的报纸上读到了这样一则故事:儿子多年在外漂泊,有所成就后带着妻儿回乡探望母亲,为给母亲惊喜,在入住母亲和妹妹联合经营的客店里时,没有告知母亲自己是谁,结果被贪财的母亲和妹妹所谋杀。“我觉得这个旅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sup>[4](P45)</sup>永不作假,是默尔索本能化生存状态的自然延续,更是在对故事的一遍遍阅读、分析之后所获取的理性认知。第二,默尔索开始借助他者——物之镜与人之镜——审视自我。人并非封闭的自足体,而他者或曰他我视野有助于人发现和弥补自己的不足。默尔索两次以铁板盒为“镜”,并在这一自我发现和认识的过程中,“几个月来第一次清晰地听见我自己说话的声音”。<sup>[4](P45)</sup>笔者认为,这并非一个人在以自言自语的非理性方式消磨时光,而是那个一度进入本能化生存之中的局外人开始理性地自我追问。此外,作家让一名记者担当“人之镜”的功能,形象化地表现出默尔索对自我的认知和反思。这位记者先后五次进入默尔索的思维“视野”,如“在他那张有点不匀称的脸上,我只注意到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它专注地审视着我……而我也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好象是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sup>[4](P48)</sup>“我感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一直用眼光盯着我。”<sup>[4](P49)</sup>可以说,这位记者正是默尔索的第二重自我——“我”在审视并反思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生命意义。由此可知,尽管默尔索看起来对关乎自己生存还是毁灭的庭审那么心不在焉,但实际上他从始至终都在专注地思考着对于人而言更具本体性的问题——人应当怎样面对审判庭所象征的社会荒诞。这也正是作家高度关注和积极思考的问题。

人的思维活动无形无色,但作家用了几个“第一次”形象地呈现出默尔索因自我审视和思考所产生的情感变化。第一次上法庭,默尔索吃惊地发现大厅内拥挤着许多前来看自己的人,而在“平时,世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当看到法庭如同俱乐部,同一圈子里的人彼此兴高采烈地互致问候,默尔索“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觉得我这个人纯系多余,有点像个冒失闯入的家伙。”<sup>[4](P46-47)</sup>这种“多余人”意识的形成,表明主人公已经开始感知和思考个体自我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非常态关系。养老院院长指控自己对母亲的冷漠,让默尔索产生了耻辱感,“我多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念头,因为我感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厌恶我”<sup>[4](P50)</sup>;而门房的证言则使他有了罪孽意识,“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我真正有罪”<sup>[4](P50)</sup>;更为重要的是,当赛莱斯特称自己是“一个朋友”,称自己是从不说废话的人之

后,默尔索“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去拥抱一个男人的想法”<sup>[4](P52)</sup>,这标志着超越两性性爱之上的,爱他的博爱意识的复苏。这些曾经被生理本能所暂时压抑的伦理道德意识逐步激活,成为默尔索从“局外人”成长为“反抗者”的重要基石。

只有当自我意识从本能状态充分觉醒后,人才会生发出对“我”的关注,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对“我”的权力,尤其是对话语权的捍卫。默尔索常被认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作家本人也曾指出“一个沉默多于说话的人是一个更价值的人”<sup>[8](P117)</sup>。但默尔索沉默的价值仅仅体现在不愿意说无意义的废话,而不是放弃自我表达的话语权。笔者承认,本能化生存阶段的默尔索确实常常懒得说话,如当玛丽问“你就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他是很想知道的,可是并没有问她<sup>[4](P24)</sup>,但是当他的自我意识逐步觉醒后,默尔索开始为自己被剥夺了话语权而感到痛苦。在第一次出庭受审前,律师便嘱咐默尔索“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发言。”此时,默尔索并未作出反应。<sup>[4](P47)</sup>但是,当感到检察官对自己的评判与事实不符,默尔索便试图“插进去讲一讲”,却被律师告知“别做声”,他说“人们好像是把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告诉他们“我本人有话要说”<sup>[4](P55)</sup>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人丧失话语权之后的被压抑、被排斥的不安,也能听到默尔索渴望争取话语权的呼声;在辩护过程中,律师按照惯例以“我”的身份发言,默尔索非常理性地对此现象做了分析:“我认为这仍然是把我这个人排斥出审判过程,把我化作一个零,又以某种方式,由他取代了我”<sup>[4](P58)</sup>正如加缪所说:剥夺语言的意义便足以使一切丧失意义,使世界变得荒诞。<sup>[9](P122)</sup>当一个人连自我表达的权力都没有了的时候,这个人也就被抹杀、被取代,被从精神上杀死了。

### 三

肉体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生死边缘,是人所能遭遇的最极端的生存困境,无疑也是人生中最大的、最易激发出深刻思想的处境。默尔索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最终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即将个人命运与社会的发展与改善相联系,与世界、与他者形成某种对话和关联,做一个创造式的反抗者。默尔索的改变可以看作是加缪关于“反抗者”思想的文学体现。“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就说‘是’的人”,<sup>[8](P157)</sup>默尔索正是这样一位反抗者。作为“从一开始就说‘是’的人”,默尔索曾对社会人生抱有美好的理想。所谓“说‘不’的人”,即坚持自我本真、不伪装、不妥协的人。当律师以人间正义及当事人权益辩护者两个身份劝告默尔索怎样做自我陈述时,后者斩钉截铁地说:“不,因为这是假话”<sup>[4](P36-37)</sup>;在上帝正义的化身即神甫面前,默尔索拒绝与之拥抱,拒绝他为自己祈祷,

拒绝称之为“父亲”。默尔索用一个个响亮的“不”拒绝与社会同流合污,但是他“并不放弃”生活本身。尽管律师曾告诉他不会有上诉的机会,他当时似乎也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但他依然对上诉问题牵肠挂肚,并要求自己对即将到来的黎明有所准备;尽管他知道“被处决者在精神上不能不与整个机制配合”,但他依然好几次在想象中制定法律、改革刑罚制度。如果说对上诉问题的思考更多关乎默尔索个人的生存与毁灭,那么改革刑罚制度则更多地与社会大众的利益与社会体制的完善相关联,也就是说在面临死亡的极端情境中,默尔索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个人自我中心,开始深入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只有在行动中我才制造出我的现实和发现我自身……而行动就是在交谈中呈现自己”<sup>[10](P456)</sup>,正是在与神甫的独特“交谈”即呐喊中,默尔索向我们呈现出了他作为创造式反抗者的一面。他告诉神甫自己的理想生活是“那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sup>[4](P68)</sup>,然后从“未来的死亡的深渊中”向神甫“喊出”一大串话,作为对神甫的应答。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被逼到死亡之境的罪犯的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不如说是主体意识充分觉醒后的现代人以非理性的形式,开始了理性地行动:履行本属于自己的表达权,在交谈中呈现和确立自我,并与对方构成一种对话关系。通过对话,默尔索成功地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自我与他者统合了起来:他重新发现了满天星光,聆听了自然天籁,对生活生发出了新的理解,也因而找到了新的意义世界。“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sup>[4](P69-70)</sup>加缪表示,“我要探讨的是,荒诞是否能在这种创造中维持下去。思维,首先就意味着要创造一个世界……创造,就是生活两次。”<sup>[3](P41-42)</sup>也就是说,真正的“反抗”是创造性地生活,而创造就是在与他者“爱”的关系中“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便是生命的意义,应对荒诞世界的正确态度与途径。在妈妈的启示下,“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进而“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喊声。”<sup>[4](P69-70)</sup>至此默尔索从“另类”的局外人成长为创造式的反抗者,真正展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因此,笔者认为将默尔索看成“荒诞的分离力量的同谋”,因而“加剧了自我与世界的间隔以及自我与他者世人们之间的不理解”<sup>[11](P74)</sup>的评价对默尔索是不客观的,也不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据笔者理解,加缪的“反抗者”与“局外人”之间是一种“相生”的关系,而非彼此脱节。而加缪的“反抗者”,诚如柳鸣九先生所析,绝非局外的孤独者,而是置身于社会关系之中,能够突破个人存在及一己利益的狭隘性,遵循在一定范围内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并在反抗的过

程中有助于人群的合作与聚集。<sup>[8] (P25)</sup>我们看到,《局外人》的主人公在其肉体生命将尽之际,终于体认到为人之价值在于正视荒诞并抵抗荒诞,对抗的方式便是在“爱”与“对话”中创造性地再活一次,为了社会的改善和大众的利益。可以想见,如有来生的话,默尔索必然像里厄那样积极地联合他人向“鼠疫”——荒诞的世界——开战。因而笔者认同如下观点:《局外人》和《鼠疫》的主角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怀着人类的良心,对世界和生活进行着反抗。<sup>[3] (P39)</sup>

### [参考文献]

- [1]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现时代的人[M]. 周晓亮, 宋祖良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 [2] 夏忠宪.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 [3] 李森. 荒诞而迷人的游戏——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经典作品重读[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 [4] 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丁世中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 [5] 加缪. 局外人[M]. 郭宏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 [6] 柳鸣九. 《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J]. 当代外国文学, 2002, (1): 36.
- [7] 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 加缪[M]. 赵建政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8] 加缪. 加缪全集(散文卷1)[M]. 柳鸣九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9] 冯季庆. 特殊话语标记和语义无差异性——论加缪《局外人》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意义[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 (3): 54.
- [10]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1] 杨龙. 自我的坚持与毁灭——“局外人”之死浅议[J]. 国外文学, 2006, (3): 86.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From the stranger to the resister: Meursaul's self-transcendence in marginal contextualizations

HE Jin-ru

(Tianjin Institute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Tianjin 300221, China)

**Abstract:** In his masterpiece named *The Stranger*, Camus revealed the western world's absurdit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tried to tell us that the right attitude and proper way for Man, who has to cope with the absurdity, is to resist creatively, that is, to refresh one's life through love and dialogue, to reunite on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s, including the absurd reality. And Meursaul's mental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the stranger to the resister, is gradually displayed in a series of marginal contextualizations.

**Key words:** Albert Camus; the stranger; the resister; marginal contextualization; dialogue

(上接第 117 页)

##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art of lacquerware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Gansu province

ZENG Ming<sup>1</sup>, LI Yan-jun<sup>2</sup>, HU Yu-kang<sup>3</sup>

(1. North University For Ethnic, Yinchuan 750021, China;

2.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3.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Any art has its own social basis of generation. To understand the art of a period and an area, one has first to underst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at period and that area. Gansu province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was situated in the only path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fluenced by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ts cul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The culture combines the factors of advanced culture in all directions, which makes its culture tak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e is diverse. The styles and engraved patterns of the art of lacquerware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Gansu Province are combined with other factors of Culture of Chu and the ideologie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he art is the joint combination of many different cultural factors.

**Key words:** lacquerware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cultural connotation; Confucianism; Taoism; Culture of Chuwu